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五九期 ——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5 b)

【文献资料】“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
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附件)
毛泽东为文革作准备的若干讲话和批示

【研究报告】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文献资料】

“五·一六”通知

【编者说明：本文原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发（六六）二六七号文件，先下发党内县团级，一年以后，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发表时原件中的“彭真同志”一律被改为“彭真”。】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个人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

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常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要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真的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份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

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人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企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

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 ∞ ∞ ∞ ∞ ∞ ∞ ∞ ∞ ∞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附件）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

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议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导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份（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份。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

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

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

“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 ∞ ∞ ∞ ∞ ∞ ∞ ∞ ∞ ∞

毛泽东为文革作准备的若干讲话和批示

◇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片段（一九六二年九月）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对柯庆施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今，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注：这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

116号上。这期情况汇报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作法。毛看后，于1963年12月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并写了以上批语。】

◇ 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注：这个批语写在中央宣传部1964年5月8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该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份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

◇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亦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的引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 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

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 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按语（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

#### 【研究报告】

评《五·一六通知》

• 谭宗级 •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毋庸讳言，他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些“左”倾错误论点，首先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经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以后曾被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通知》，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和集中表现，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此，剖析《通知》，对于进一步认清“文化大革命”在理论、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从中汲取教训，是有益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同时，他



还提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根据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指示，中央书记处于四月十二日作出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四月，在上海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组成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负责起草《通知》。《通知》先后八次易稿，经过毛泽东同志多次修改审定，于四月二十四日提交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然后，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五月十六日正式通过，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到县、团一级党委。一年以后，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从《通知》的结构来看，它包括三个部份。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二是罗织《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逐条进行无限上纲的错误批判，提出一整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政策。三是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通知》涉及的范围很广，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剖析。

##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之所以错误，首先就在于它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

一九六六年五月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十七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有十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暂时困难业已克服。党内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人民是团结的，社会是安定的，人民政权是巩固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以上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国内还存在某些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也需要继续调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总之，当时并不存在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通知》却无视这一基本形势，错误地把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社会，把我国的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

《通知》在第九条里对六十年代前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这种概括一笔抹煞了建国十七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和主流，而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五界和上述报纸、广播等十三个方面，所有这些文化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毒草丛生、牛鬼蛇神充塞的黑暗世界，这些论断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思潮严重，党内和国家民主生活受到了削弱以至破坏。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之后，一方面是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宁左勿右”的思想情绪日益滋长，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情况，直到传达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陈毅同志在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后，才有所缓和。

但为时不久，毛泽东同志便在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发出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认为文艺界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已蜕变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领域里的“左”倾思潮又发展起来，错误地批判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打击了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的还被说成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对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政治定罪。到一九六五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后，特别是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同志后，无限上纲，罗织罪名，这种政治批判愈演愈烈。《通知》下达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严重混淆。从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三反分子”的帽子满天飞，陷人于罪的棍子到处打，大兴“文字狱”，造成了严重后果。

《通知》不仅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而且对六十年代中期整个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也作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和判断。最使人惊心动魄的就是《通知》中的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而且《通知》还说，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个别的”，而是“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也就是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篡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且渗透到党、政、军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遍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照此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是危机四伏，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了。这是一幅对社会主义现实作了多么严重的歪曲的图画。

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估计，所谓“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后来毛泽东同志也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实际上这样的形势和随之而来的任务并不存在。因此，无怪乎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对这场“革命”的发动感到“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这场运动根本违反了人民的意愿，当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 （二）

《通知》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首先,《通知》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学术观点上的矛盾,同革命和反革命的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提出要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打倒、清洗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通知》把敌我矛盾的政治问题和人民内部的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把政治问题视为禁区,不准讨论,不许被批评者申辩。《通知》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为依据,来抹煞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应当怎样理解“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列宁解释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列宁全集》第4卷191—192页)

更何况,“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根本就不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据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批判和反对修正主义,但是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其结果是“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著名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一律加以批判、打倒。

《通知》认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第二条)很明显,《通知》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学术讨论、理论探讨,武断地认定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不仅完全违背了在学术上必须实行“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必须反对企图用粗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做法,而且其结果必然是把错综复杂的学术领域里的不同意见简单地归结为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把“百家争鸣”说成实际上是“两家争鸣”。这就在实际上既取消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的任务,也忽视了我们当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而且这样一来,就使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都可以被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签,于是这个斗争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通知》提出无产阶级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这就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历史遗产一贯的理论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如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批判继承的方针,这是人所共知的。列宁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作过坚决的斗争,批判过所谓要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口号。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著名演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348页)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下同

〕第2卷499页）应当说，这些道理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与此相反，《通知》却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请问怎样消灭呢？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凡是不符合他们帮派口味的，管它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一律斥为“封、资、修”的“黑货”而加以封禁、销毁，对这些作品的作者一律予以打倒，甚至投入监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时之间造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那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的淫威下，连郭沫若同志也不得不违心地宣布要把自己的著述统统付之一炬！所谓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说到底，就是毁灭文化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造成的恶果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到处盛行；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愈演愈烈，造成了一场文化学术的大灾难。

其次，《通知》主张“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第四条）。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通知》说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什么是“专政”呢？列宁说得好：“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列宁选集》第3卷835页）这就是说，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把专政手段移用于思想文化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毛泽东选集》第5卷391页）因为一定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只能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实现。因此，企图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强制解决某种思想文化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某种观点、某部作品、某一出戏、某部影片，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常常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作阶级敌人、革命对象，而对他们实行专政，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地提出所谓“在思想领域专政”，“在意识形态专政”，“把文化部办成意识形态里的公安部”，以及张春桥鼓吹所谓“全面专政”论，都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论断歪曲引用、任意延伸的结果。“四人帮”肆意抹煞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似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切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敌我斗争，都要实行专政，这是他们敌视人民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的。

再次，《通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命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明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有权探索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不论是谁掌握了真理，人们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即尊重真理，服从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掌握了真理（包括掌握了部份真理）的人，从来都是采取尊重和学习的态度的。这就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尽管有的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照样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份，用来建立和证实自己的理论，并不因人废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态度，便是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份才创立起来的。同样，列宁并没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后期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否定他前期在俄国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也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强调，真理只有一个；不要跟一个人，要跟真理，谁发现了真理，就服从谁，管他是挑大粪的，还是干别的什么的。“我们除了科学以

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毛泽东选集》第5卷131页）这表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通知》却认为这个观点否认了真理的阶级性，斥之为“资产阶级口号”。但真理有阶级性的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这就是说，从人们的认识形式来说它虽然是主观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客观的。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认识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因此，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承认真理有阶级性，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客观性的观点，就会陷入诡辩论和相对主义。《通知》以真理有阶级性的错误论断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确观点，恰好证明这一观点是不可驳倒的。

《通知》接着又把在真理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论题一下子改变为完全不同的论题，它问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第四条）很明显，这些问题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问题，这种改换论题的批判当然是很错误的。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便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就在客观上助长了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人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在真理面前象在封建社会一样有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关系，只有某些人或某个人才有权有资格掌握真理，其他的人只有等待这些人的“恩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辉。而掌握真理的人，又一定是睿智非凡的伟大天才。这种人的地位越高，真理就越多，地位达到最高峰，他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他的话就成了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这种真理化身的人的言论，只能成为信仰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别人无权研究，最多只能进行注解阐释。谁如果要探讨、研究这些言论是否正确，就会被认为亵渎神圣，大逆不道，横祸便会从天而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异议，不仅被开除党籍，陷身囹圄，而且竟惨遭杀身之祸。这种理论上的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最突出的是《公安六条》中规定的“恶毒攻击”罪，不少冤案都由此而来。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权力真理”观并未绝迹。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同志，实质上还是坚持“权力真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最后，《通知》还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主张以“破”代“立”。必须全面理解破和立的辩证关系。破，是对旧事物的批判和否定；立，是扶植和支持新事物的产生、成长和发展。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绝不能互相取代，决不能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可见破和立是不同的两个范畴，绝不能说，立等于破，可以以立代破；也不能说，破就是立，可以以破代立。我们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还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建立了国营和集体所有的两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建设和斗争，才能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呢？我们干革命，破并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被打碎的旧社会的废墟，而是为了在这个废墟上建立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破，是为立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的。立，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立的任务往往更艰苦更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更长的时间，决非一蹴所能成就的。把破当成目的，说破就是一切，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破无疑是中心任务，那时

应当破字当头。但是，当工人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破的任务虽还未完成，但立的任务即建设的任务却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我们党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表明我们已把立提到首要地位，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不能说是任何时候都要“破字当头”。老是破，不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怎么谈得上立、谈得上建设？应当说，没有破是不可能立的。但是没有立，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破；没有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会自行到来。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它建设好，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破除掉。因此，《二月提纲》说的“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通知》却斥之为：“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条）这样无限上纲，大张挞伐，实际上是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破的绝对化，推行“破就是一切，破就是立”的“捣乱哲学”大开方便之门。

### （三）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十六条》强调的“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一再论述分清敌我的极端重要性，他着重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3页）恰恰在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了敌我，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通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判断，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致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视为“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号召对他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统统打倒。

在我们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虽然党内也混进了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但在党内并没有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指什么人，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二十三条》提出这一概念，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无确定的标准，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因而同样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可以昨天是“走资派”而被打倒，今天是革命派又成为结合的对象，明天因不合“造反派”的口味再度被打成“走资派”。这种变幻莫测的政治沉浮，完全要看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态度如何来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上自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甚至连炊事班长、汽车班长、生产组长也都成了夺权的对象。因为“走资派”的内涵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都可以被说成是“当权派”，而“当权派”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成千上万个“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这样一个既不确定又不科学的概念，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便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林彪、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大搞“普遍罢官”、“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就是利用了这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走资派”的“左”倾概念。

总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涵义不明确，“当权派”所指又非常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便错误地把党内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只能扩大打击面，而被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来作为“打倒一切”的根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滥施淫威，致使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无

享受到诬陷和迫害。如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三人，除去世的三人外，遭受诬陷的达二十人之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九十四人，除有病、去世的三十一人外，遭到诬陷、“靠边站”的九十六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仅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案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1980年11月2日））实践表明，“走资派”这个概念并不是“科学的抽象”，而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方便手段，我们必须坚决摒弃这个“左”倾错误的概念。

《通知》第九条提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结语又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以后，《十六条》又规定要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所谓“反动”，不言而喻，指的当然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用语。但其结果，凡是权威的，即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被看成就是“反动”的学术权威，都被纳入清洗、打倒之列，甚至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几十年、卓有成就的老同志也不能幸免。在林彪、江青一伙肆虐横行的日子里，文化界的大批知名人士横遭迫害，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遭受迫害的就达二千六百余人之多。（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1980年11月2日））

总之，由于混淆了敌我的界限，就使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同情他们的广大群众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以上从形势估计、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等几个方面，对《通知》作了一些初步的剖析。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应当经常注意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压迫人民、蜕化变质的道路，这的确是一项长期的严肃的任务，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大课题，绝不可等闲视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这是部份的、小量的）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主要的、大量的），而决不可以主观臆断，夸大敌情，以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而决不可以抛开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法制的手段，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可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总之，决不可以采用《通知》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方针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仅仅进行一次，已经使我们深受其害，至今犹有余痛，以后决不能再搞了。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牺牲得来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永志不忘。

恩格斯在一八九三年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过：“没有那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49页）我们党全面地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纲领，找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采取了许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有力措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兴旺发达的生动景象，目前正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有信心，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定能够象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

用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这场历史的巨大灾难。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8期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